

陈 景 华

陈景华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同盟会暹罗（今泰国）分会的主要创始人和负责人之一，是暹罗爱国革命华侨中一位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所主编的《华暹日报》，在鼓吹反清斗争、倡导革命思想和激励广大华侨爱国热情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后来，为了直接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又辗转于香港和广州等地。在民国成立初期，继续从事有益于祖国的改革工作，直至牺牲在反动军阀的手中。他是一位对中国民主革命事业有过贡献的东南亚华侨。

亡 命 暹 罗

陈景华（1864？—1913），字陆遼，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清同治初年生，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后任广西贵县知县^①。

陈景华青年时就胸怀大志，很想对国家有所建树。按照封建

^① 《香山县志续编》卷九，选举表六。

社会的规律，一个有抱负的人只有中科举才能做官，只有做官才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干。陈景华最初也未能跳出这种局限，“致仕立功”，这是他的理想。到任之后，他就想凭着自己的精明强干和才智过人干出一番事业来。如果处在封建社会的一个平稳时代，陈景华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干员”、“能吏”而出人头地。但是，他所处的却是封建社会正趋于腐朽没落的时代，是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这样一个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时代，他的幻想很快就被冷酷的现实打破了。他所要报效的清王朝，此刻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了。它对外屈膝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武力之下，对内寄生于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的剥削压迫之上，弄得国家受辱，民不聊生。这个政府不但丝毫不能代表和维护国家的利益，反而时时处处在靠损害、出卖国家的利益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它怕的就是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情，堵的就是那些志士仁人千方百计所要探索的救国之路，它所需要的则是那些能帮它苟延残喘的奴才和庸才。陈景华既然怀有报国之心，又是一个有志之士，等待他的就不能不是一场厄运。

1908年正是广西民众反对贪官污吏斗争风起云涌的年头，为了加强对该地区人民的镇压与控制，清朝新任两广总督岑春煊亲临梧州督办广西军务。岑的外号叫做“癩三”，是个处事轻浮、任性跋扈的人，与陈景华的刚直性格决定要发生冲撞，而胜者总是官大的。不久，陈景华便被宣布撤职查办^①。尽管捕官因属“同寅”，对陈还算照顾，但一个县太爷一夜之间变做阶下囚，对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更重要的是，他早先设想的“致仕救国”之策也在此刻彻底破灭了。政治的腐败，官场的黑暗，都使他愤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670页。

恨之极，夜不能寐。自古以来，官场之中，忠遭奸妒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岳飞的时代，在袁崇焕的时代，做臣子的只有含冤受死，留待后人去为自己昭雪平反。所幸的是陈景华官还不大，更幸运的是他生在封建制度土崩瓦解的时代，而他的故乡又是诞生过孙中山等这类新式英雄的故乡，这一切，都使陈景华没有效法那些传统道德上的“楷模”，去尽什么“愚忠”，而是选定了一条叛逆的道路。一日清晨，人们但见他床头的双鞋仍置地，蚊帐低垂，以为他还在熟睡，岂知他却早已利用捕官疏于防范之机逃之夭夭了。他先遁往香港，后又转赴暹罗，以他那果敢的抉择，机智的行动与清王朝彻底决裂。

暹罗是东南亚华侨的主要聚居地，有南洋华侨人数之冠的称号^①。这里的广大华侨也与其他地区的华侨一样，吃苦耐劳和热爱祖国。他们身居异乡，由于受到西方殖民者的经济压榨与政治歧视而迫切地希望祖国强大起来。他们之中的有识之士，更是对清政府听任列强瓜分中国的屈辱而感到痛心疾首。这批人中很多具有反清的血统，他们的祖辈，从郑成功的部下到太平天国的将士，乃至形形色色的反清会党门徒都有。但是，他们却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因而难以形成有力的社会政治力量。尽管如此，暹罗依然受到当时正在海外活动的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视。这里的华侨人数众多，实在是一股巨大的革命潜在力量。为了动员这股力量，孙中山于1908年7月亲临曼谷。由于当局的干涉，使他不能作长期的逗留，但他还是设法结识了当地侨界的知名人士萧佛成、沈荇思等人，向他们灌输了自己的革命思想，与之建立了联系，并希望通过他们进一步影响暹罗的华侨木众。

^①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华侨志总志》，台北，海外出版社，1956年，第141页。

陈景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暹罗的。他的逃亡身世，决定了他首先要与这些具有反清思想的人士接近。正是从他们那里，陈景华开始真正接触到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他对中国现状的绝望，迫使他去寻求新的政治主张，罪恶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他身上打下的痛苦烙印，更激发了他去探索新的救国之路的热情。孙中山提出的“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革命纲领立刻就在他那苦闷的胸中点燃了新的希望之火，使他在迷惘之中，眼界顿开。随着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逐渐成为海外爱国华侨所拥护的一面旗帜。同盟会南洋总支部在新马地区的活动，也在暹罗华侨思想上掀起了波澜。陈景华的眼前展现出一条新的救国大道，他果断行事的性格又一次起了作用，他没有犹豫，没有彷徨，立刻就投身到实现这个新理想的斗争中去。就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陈景华完成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变：从清王朝的一名叛臣变成了反清革命的坚定斗士，从此走上了革命救国这条爱国主义的正途。

鼓吹革命

虽然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在暹罗华侨社会的一些先进人士心中扎了根，但要把它从小圈子里逐步引向华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去，仍是陈景华等人面临的艰巨任务。当地的许多华侨虽然不乏爱国热情，但由于他们身居君主专制制度的暹罗，又长期受到“忠君即是爱国”的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他们对如何爱国这一具体问题上，认识还模糊不清。不少人心目中仍然希望能有一个“好皇帝”来保护他们，在他们眼中，孙中山不过是“草寇造反”，似乎难成气候。此外，康梁等维新派在失败之后，也以海外为阵

地，进行了一系列的“保皇运动”。他们的主张在暹罗华侨的上层人士中还很有影响，他们与封建正统派虽有“帝党”和“后党”之分，但对孙中山的革命派都同样采取敌视的态度。在这两股势力的把持下，拥清保皇的观点在暹罗华侨思想界还有着很大的市场，而革命力量的发展也较其他地区缓慢。要尽快地打破这种落后、闭塞的局面，首先就要做好面向华侨大众的宣传发动工作，而最好的宣传方式又莫过于办报。于是，陈景华与萧佛成等决定，无论如何困难，也要在曼谷创办宣传革命的华文报纸。在香港《中国日报》的帮助下，经过一番筹备，暹罗华侨第一家宣传反对清廷，鼓吹革命的报纸——《美南日报》，终于在1906年问世了。然而，从它呱呱坠地之日起，伴随而来的就是多灾多难。《美南日报》很快就被经费问题所困扰，不得不进行改组，并易名为《湄南日报》，陈景华任总编辑。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与种种困难搏斗，充分发挥了报纸的作用，宣传革命理论，“激烈地鼓吹排满，骂虏廷，骂留辫子……”^①。他笔下的一篇篇檄文，犹如块块投石，冲破了原来那沉闷的一潭死水，给暹罗华侨思想界带来了生气。由于陈景华文笔犀利，见识过人，又属敌对阵营中的反戈一击者，故他的文章常常能够切中时弊，将清朝统治阶级祸国殃民的反动本质在广大华侨面前揭露无遗。在报纸舆论的影响下，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主张，开始在暹罗华侨中流行开来，而陈景华的声望也日渐隆起。

但是，事情并非一帆风顺，新的阻力接踵而至。行将就木的清王朝企图垂死挣扎，一改往日盲目敌视华侨的政策，代之以种

^① 萧佛成《暹罗华侨革命过程述略》，载《三民主义月刊》，1936年，7卷4期。

种笼络的姿态，妄图在海外争取人心，以破坏华侨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支持。他们当然不会忽视暹罗这块阵地。1907年，西太后特派大臣杨士琦为商务专差，在两艘军舰护卫和大批随员的陪同下，来到暹罗，对华侨进行所谓“宣慰”。这些军舰用来杀敌卫国不行，用来充门面、摆威风倒还是有些效果。果然，这套“恩威并重”的手段确实也迷惑了不少华侨，他们纷纷“结彩欢迎”，表示效忠皇室。同时，康梁为首的帝党维新派虽然在与革命派的海外大论战中已处下风，但仍然把暹罗看作自己必须保住的阵地。保皇党的第三号人物徐勤也在这一年到暹罗进行频繁活动。他采取“打进去”的手法，较之后党的空摆门面似乎更有“成效”。不久，他居然骗取了《湄南日报》半数以上理事的支持，竟将该报改为《启南日报》，从一个宣传革命的工具，摇身一变，反成了保皇党人的喉舌。主笔陈景华自然也因为“鼓吹革命而不合一般拥清商人的口味，就被股东们逐了出来”^①。一时间，“忠君”与“保皇”的气焰又猖獗起来。这对革命派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陈景华虽遭此挫，并未气馁，在临走前仍作了一篇“激烈痛骂的论说”^②。之后，他与萧佛成决定合力再办新报，与之抗衡。在马兴顺等爱国人士资助下，取名为《华暹日报》的新报纸在逆境中诞生了。社址设在曼谷生日桥街58号。为了扩大影响，该报分中、泰两种文字发行，陈景华任中文版主编。在他的努力下，该报创刊不久就获得各界舆论的好评。1908年出版的《二十世纪暹罗印象记》一书中，称该报的泰文版是“正直不阿，孑然独立”，称中文版“更加激烈地反映了支持者的革命精神”^③。在这块阵地上，

① 萧佛成上引文。

② 萧佛成上引文。

③ 史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第五章，甲，“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以陈景华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笔战。这不仅是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不同政见的较量，也是当时华侨思想界存在着革命救国与“忠君救国”这两种对立思潮之间的斗争。随着革命派在论战中的节节胜利和孙中山在广大爱国华侨心目中的威望不断提高，清朝政府在海外日益丧失人心，“忠君”、“保皇”的论调在暹罗华侨社会也渐渐失去了市场。1908年，尤列从新加坡来到暹罗，办起了《同侨报》^①，与《华暹日报》一起鼎力夹击，终于使保皇派难以招架，《启南日报》生存了仅一年多的时间便因遭到广大读者的唾弃而不得不宣告倒闭。革命思潮从此占了上风，而《华暹日报》则很快与新加坡的《中兴日报》等报刊一样，成为南洋华侨中鼓吹革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报刊之一。陈景华也因此更加出名。他办事有力，讲求实效，很快就成了暹罗华侨中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之一。

宣传战的胜利促使革命工作进一步向新的阶段发展，陈景华与萧佛成、王杏洲、陈美堂、何少禧等人一起建立了中华会馆，努力把广大爱国华侨团结在自己周围，为日后同盟会分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1908年11月，孙中山先生第二次来到曼谷，这与他第一次到暹相隔五年，但情况已大不相同，成百上千的华侨群众从各地赶来，聚集在中华会馆，对他表示热烈欢迎，大振了革命派的声势。孙中山除了发表公开演讲之外，还在《华暹日报》社楼上亲手创立同盟会曼谷分会，由萧佛成任会长，陈景华任书记。同盟会成为团结华侨，宣传革命，筹措起义经费等各项革命活动的正式领导机关，《华暹日报》（后改名为《华暹新报》）也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从此，暹罗华侨的革命活动进入一个新时期，

^① 冯爱群《华侨报业史》第六章，“泰国的侨报”，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9月。

工作进一步走上正轨，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书报社”也在暹罗各地纷纷建立，华侨中剪辫易服，捐款出资者，踊跃成风。广大华侨工人、职员以及商业、银行业和企业界的人士都积极行动起来，为革命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和援助，甚至原来互相敌对的一些洪门组织，也在同盟会的调解下联合起来。可以说，在陈景华等人数年不懈的努力下，此时革命思潮终于压倒了忠君思想，成为暹罗广大爱国华侨的思想主流。而以筹款、宣传、运送起义枪械等诸多的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就成为这一时期暹罗华侨爱国思想的具体体现。

回 国 前 后

在革命潮流日趋汹涌的形势下，暹罗的拥清派们黔驴技穷，他们勾结起来，用各种方式破坏革命活动，甚至不惜采用最卑鄙的手段暗杀革命党人。他们暗中侦察革命党人的动向，随时向清政府告密。于是，“但凡同志一回中国就被地方官吏捉去”^①。1909年春发生的“马兴顺事件”便是一例。同盟会主要成员马兴顺因事返潮州原籍，保皇党人立即电告清朝两广总督，将马以“附逆党”罪下狱。同盟会急忙委托陈景华火速赶赴香港营救。经过多方斡旋，始由广东名绅江孔殷等出面保释。但马回暹后不久，终因在狱中备受折磨而患病身亡。陈景华生性刚直，自然不会被清政府的高压手段和保皇党的下流伎俩所吓倒，相反，这更激发了他彻底推翻清朝的决心。同时，大陆上真刀实枪的武装起义和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也令他十分神往。他在暹罗办报的经历，固然证明

^① 萧佛成上引文。

了他具有作为一个宣传鼓动家的才能，然而，就他本性而言，他更是一个实干家。他不满足于在后方进行“第二线”的工作，渴望去参加更直接的实际斗争。这种心情促使他下定决心，于1910年离开了暹罗。由于身遭通缉，他还不便马上潜返内地活动，但他认为在香港从事革命工作会较留在暹罗更有成就。行前，他特地取道新加坡面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考虑到他此行不可不多备活动经费，但又为自己手头拮据而发愁，忽然想起张静江才送来的几枚金钱，急嘱家人从囊中取出，尽数送陈。其时，“金钱之热度犹未去”^①。陈景华深为感动，以后常向人提起此事，每每以此来鼓励自己和同志的革命斗志。

从暹罗到香港，陈景华舍弃了自己“报业名人”的声望，默默地从事着地下工作；他还舍弃了自己“侨界领袖”的地位，甘当一名普通的联络人员。他明为韦宝珊洋行的买办，暗中则利用洋行中的信箱，为同盟会南方支部建立了一个安全可靠的通讯处。他还积极参与一些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当时，同盟会员刘思复为暗杀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密制炸弹失事，受伤被捕，关押在香山县监狱，就是由陈景华利用旧关系疏通了县官，并再次运动江孔殷等出面营救而获释的^②。

辛亥首义之后，清王朝垮台了，广东成立了都督府。革命的热情与动荡的政局夹杂在一起，使当时的省城面临着百废待兴、鱼龙混杂、社会治安一片混乱的局面。就在此时，陈景华被都督府任命为第一任警察厅长回到了他经常思念的祖国。他的全部聪明才智，在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位置上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和发

① 邓慕韩《孙中山先生轶闻》，载《建国月刊》，1929年，2卷2期。

②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670页。

挥。他年富力强，雄心勃勃，精力充沛，事必躬亲，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他要安定局面，要整顿和改革，要实现他早年的抱负和理想。综观他在这一时期的政绩，可以归纳为如下几条^①：

一、整顿警吏。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支有素质、有效率的警察队伍。他精选警员，严格训练，更新武器装备，很快收到了效果。他还利用空暇微服私察，巡查岗警的勤惰情况，并向市民征询对警政的观感，使得警吏不敢马虎。不久，广州的警务便使人有面目一新之感。

二、镇压盗匪。广州刚克复，公开和秘密的会党不下一二百个，其中杂有不少不法之徒，一时间，盗匪横生，偷摸拐骗，杀人越货，时有发生。陈景华采取了“乱世用重刑”的方针，利用都督府在非常时期授与警厅的“杀犯权”，严厉地镇压了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诚然，陈景华在处理某些案件时，程序上或许有缺点，如在没有正常的法律秩序下进行“公堂断案”。但他的立意是要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广大市民的生命财产。在他的主持下，广州的治安在短期内一度迅速好转。

三、革除陋习弊端。旧广州城内街上都设有街闸，设更夫巡逻，控制市民出入，它既妨碍交通，又妨碍警察捕盗，出现火警时更为麻烦，但是各街的绅富们却利用“管理”的名义从中充饱私囊。故长期以来这种“割据”的局面无法消除。陈景华上任之后，决心根除这一弊病，严加督促，限期拆除，终于达到目的，改善了市容。他还不顾某些人的反对，严禁公娼，为维护政府的经

^① 陈景华的改革，参见邹鲁上揭书，第1670—1676页；林仁《清末民初广州的警察机构》，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1辑，95—101页。

济，严禁白银外流，限制迷信活动，把街内多余的庙宇一律改为市民的活动场所，等等。

四、实施新政。旧广州街头夜间只有油灯照明，在陈景华的主持下，全市街道首次统一装上了电灯。他还颁布了户籍制度，开始普查人口。当时有些市民对新法不习惯，常常隐瞒不报出生与死亡人数。陈景华下令各市区的医院、产院，甚至各个棺材铺，对人口的增长与死亡都要做好确实详细的登记工作。他还引入一些科学的办案方法，如建立罪犯档案制度和指纹制度等。

他大刀阔斧，我行我素，雷厉风行地推行着改革，毫不顾忌保守势力的反对与阻挠。他的目光还不局限于省城一隅。在他任内，开始与暹罗警方当局谈判，商议引渡罪犯的条文^①，并为改善中暹关系而尽力。在他任内，西沙群岛的防卫成了都督府与海军之间的扯皮问题，他自告奋勇，由警方组成警察队，备足枪弹服装，乘专轮赴海岛守护。他上任才一年多的时间，就“把这个非常时期的省会，办理得井井有条”，呈现出“地方平静，百废兴举”的气象^②。

慷慨成仁

陈景华执法如山，铁面无情。即使是自己的亲朋，也绝不苟以私情。在那些盗匪歹徒眼中，他俨然是一个“凶狠”、“冷酷”的“悍吏”。对此，他全不放在心上。最使他头疼的，倒是那些为富不仁的豪绅富商们。他们有名望，有地位，有靠山，有势力，陈

^① 王基朝《中暹关系及暹罗华侨之概况》，载《新亚细亚》，1933年，8卷3期，第82页；梁寄凡“中暹关系再检讨”，载《华侨先锋》，6卷8期。

^② 邹鲁上揭书，第1670—1671页。

景华每要前进一步，都会因触犯了这些人的利益而遭到抵制。他要拆除街闸，“街霸”们丢了“荷包”，便上街请愿，要求收回成命，陈景华严令拒绝了。死人要登记，棺材商们嫌麻烦，视为苛政，竟联合罢市反抗，也被陈景华压服了。禁止公娼，剥夺了那些承办花捐者的收入，他们就鼓动陈的堂弟前来说项，又被陈义正词严地骂了出去。……陈景华与富人们的矛盾一天天地尖锐起来。然而，对那些被污辱和被损害的穷人弱者，陈景华却深怀怜悯和同情之意。一日，警察带回一名被主人打伤的婢女，他立刻放下了平时的“威仪”，对她好言相慰，并给衣给食，请医调治。为此，他动了要筹办一所收留这些受迫害妇女“教养院”的念头。但是那些平日以“善长”、“仁翁”自许的阔佬，对此事非但不肯帮忙，反而冷嘲热讽，大加反对。陈景华极为愤怒，也很受刺激，他开始怀疑：民国了，社会革命的目的是否就达到了呢？在看完反映当时社会不平的新编话剧《声声泪》^①之后，编剧兼好友潘达微邀他为该剧题词，陈景华当即奋笔写下了“天地不仁”^②四个大字，并自署“世界罪人陈景华”为落款。他对贫富二者截然不同的态度，固然反映了他的人品，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救国道路上并没有停止不前，已朦胧地意识到，单是推翻一个清王朝还不能拯救中国，从而对整个吃人的旧世界发出了抗议，同时也显示了自己决不与黑暗势力妥协的气概和要重新改造天地的抱负。这一点，对比他的大多数同时代的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难得的进

① 陆丹林、冯伯恒《潘达微生平述略》。载《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第226页。《声声泪》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收尸者、同盟会员潘达微所编的一出话剧，内容反对社会不平，揭露传教士、慈善家、新官僚的欺世盗名。

② 邹鲁上揭书，第1675—1676页。

步。但是，如何去改造，由于历史的局限，他还不能找到明确的答案，只能凭着自己的勇气，一意孤行。他力排众议，自筹自办了一所女子教养院，收养了数百名不堪受虐的婢女、侍妾、童养媳、尼姑和幼妓等受苦妇女，让她们分班受教习艺。以后，他又创办了孤儿教养院，收容那些无父母抚养或被拐卖的儿童，委任职员对他们施以衣食和教育。这些都受到了中外舆论的好评。陈景华也自认是自己平生的一大快事。他高兴地说：“生平有此一举，死也没有遗憾了”^①。但是那些妾跑婢逃的劣绅买办们，也因此对陈更加恨之入骨。

1918年，时局再次动荡起来。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反动军阀龙济光率军攻占了广州，就任广东督军。革命党人都纷纷离开广东，重散海外。而一向果断行事的陈景华此刻却犹豫起来，因为接办教养院的工作一时还没有办妥，他不忍丢下数百名苦弱女子，只身离去。十多年前的夜晚，清政府逼得他不得不亡命海外。如今民国了，自己是有功之臣，执政后又一向秉公办事，正直无私，龙济光可能一时还不敢对自己下手吧？陈景华多少还存有些幻想。但是，这次他想错了。土豪、奸商、买办、劣绅这股旧势力在气候逆转中重新蠢起，朝陈景华扑来。他们纷纷向袁世凯献媚，造谣、诬告陈景华。袁则久有翦除异己之心，当即密电龙济光“就近办理”。慑于陈景华的威望，龙济光一时未敢公开下手。到了中秋之夜，龙以赏月为名，将陈骗至督军府中，示以袁电。陈景华看后并无惧色，只是索酒一瓶，痛饮之后，慷慨就义，死时尚不满50岁^②。公布之日，社会哗然，教

① 邹鲁上揭书，第1674页。

② 邹鲁上揭书，第1674—1675页。

养院的妇女们更是如丧考妣。

陈景华是开辟暹罗爱国华侨革命事业的先驱，是一位有功于辛亥革命的志士。虽然他早年曾走过一段弯路，但一旦他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之后，便一直坚定不移地为这一事业鞠躬尽瘁。尤其可贵的是，他那高度的爱国热情在各种困难面前始终不减，这就促使他能在探索救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可惜他壮志未酬，一腔热血竟洒于反动军阀之手。

（邓 原 秉明鲜）